

文化的长城 汉语的丰碑

——评八卷本《汉语大字典》

黄孝德

为改变我国辞书出版落后的状况,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下,1975年夏天,国家出版局制定了一个全国辞书编纂规划,决定出版150余种辞书。其中,规模最大、最难编写的有两种:《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鉴于当时条件,谁也不敢单独承编。几经讨论,最后决定由湖北、四川两省出版社组织武汉大学、四川大学等九所高等院校承编《汉语大字典》,由上海等五省一市承编《汉语大词典》。从这时起,《汉语大字典》就和武大结下了不解之缘。几届校领导均参与该书工作委员会工作,中文系汉语教研室几乎全部投入编写,李格非教授任该书第一常务副主编,20余位正、副教授和其他专家任该书编委、主要撰稿人和审稿、总稿人。许多同志为之工作了整整14个春秋,有的积劳成疾,竟倒在案头,未能目睹全书杀简。

《汉语大字典》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六五”规划的重点项目。在国家出版局和两省出版局的大力支持下,1986年出第一卷,至今年八卷出齐。此期间,发行量即突破十万大关,在国内外获得很高的评价。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新华文摘》、日本《朝日新闻》等国内外重要新闻媒体报道了出版消息或发表了评论。美国远东出版公司、英国牛津出版社、香港文学社都在洽商出版事宜,有的已达成协议,正在排制新版型。在国内,它先后获得北京新华书店等单位举办的“全国优秀畅销书奖”;《光明日报》等单位的“中国图书奖荣誉奖”;国家新闻出版署的“金钥匙奖”;湖北印制本还获中南五省(区)第四届艺术研究会的“整体设计奖”、“优秀封面奖”、印刷技术“最嘉产品奖”。美国1987年版《吉尼斯世界纪录大全》列专条介绍《汉语大字典》,同时还提到台湾的《中文大辞典》,称这两部书为“当今汉语字典的‘世界之最’。”它也是湖北地区解放以来第一个专条列目收进该书的产品。

《汉语大字典》为什么能得到如此多的荣誉和称赞呢?原因在于它规模最大、解释最新、书证最全、体例最精,它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汉语字典。

一、规模最大

说起大型汉语字书,人们就会想起《康熙字典》(以下简称《康熙字典》),它是清代康熙年间成书的一部官修的大型汉语字书,它在我国辞书史上和世界辞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

汉语字书,源远流长。相传从周代太史籀著《史籀篇》起,我国就开始编制字书。到东汉许慎著《说文解字》、梁陈之际顾野王著《玉篇》,我国就有了规模较大的古代汉语详解字书。自是以后,宋有司马光的《类篇》^①,明有梅膺祚的《字汇》、张自烈的《正字通》^②等一系列字

书，还有《尔雅》、《释名》、《方言》、《切韵》、《广韵》、《集韵》等雅书、韵书，以及其它古籍注疏广为流传。汉语字音义训极为丰富，在世界诸语种中特别引人注目。《康熙字典》将历代字书、雅书、韵书和其它古籍中的字音义训汇集一书，其规模确是空前的“大”。此书被康熙钦定为“字典”，在当时有不容怀疑的权威性。这对当时“同文之治”，对汉语文字的统 一 和 规范，其历史作用不可低估。

《康熙字典》之后，有民国初年陆费逵、欧阳溥存的《中华大字典》（以下简称《中华》），有日本汉学家诸桥辙次的《大汉和辞典》（此典用汉字列目，汉语文例举证，其释义则用日文。以下简称《大汉和》），有台湾林尹、高明等的《中文大辞典》（以下简称《中文》）。前者为字书，后两种为字书兼词典性质，都是大型汉语辞书，虽在词条收集上大有增益，但在收字规模上都没有超过《康熙字典》。它们发行后，在字书影响上，也远远赶不上《康熙字典》。《康熙字典》仍然一版再版，从皇家的专利品（在清代常是皇帝赠赐大臣的礼品，一般人难以得到），变成一般知识分子的案头书，没有那一部字典能够取代它。

《康熙字典》成书至今已有270余年，历史在前进，汉语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代的读者因不熟悉反切注音和传统的训诂方式，已很难使用《康熙字典》，并从中得准确的语言信息。时代呼唤着要有一部规模更大、具有新的权威性的汉语字典，来满足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需要，以利汉民族文化的发展和汉语言文字进一步的统 一 和规范。

《汉语大字典》就是一部新编的、比《康熙字典》规模更大的汉语字典。

《汉语大字典》是楷书汉字大汇编。

汉字从甲骨、金文、小篆、隶书发展到楷书，经历了很长的历史阶段。从晋代起，楷书才兴盛起来。此后，汉语字书、韵书，即以楷书汉字为说解对象，留下了许多著名的著作。以其收字规模而论，《玉篇》收22561字^③；《广韵》收26194字；《集韵》收53525字；《类篇》收53165字；《字汇》收33179字；《康熙字典》收47043字；《中华》收4万字左右；《中文》收5万字左右。在《汉语大字典》以前的字书、韵书中，收字最多的是《集韵》和《类篇》。《康熙字典》收字比较慎重，删掉了《集韵》、《类篇》中无书证来源的一些异体字；其所收字数，反映了从魏晋唐宋以来直至清代初年楷书汉字的实际情况。《汉语大字典》收字57000左右，比历史上任何一部字书、韵书收字的规模都大。

《汉语大字典》收字的方针是：“收集从宽，入典从严，删除旧辞书列目字要慎重。”在编写中，它还根据“利今、存古、规范”的原则，在广泛收集的基础上，对全体楷书汉字进行科学的清理，这就使它不致漏收不应漏收的字，也防止了收字过滥的毛病，使它的收字规模基本达到了凡古今字书中查不到的楷书汉字，在《汉语大字典》中都可以查到其合乎规范的字体。

《汉语大字典》也可以说是古今汉字大汇编。

为了正本清源，解释楷书汉字形、音、义历史演变的史迹，《汉语大字典》在楷书汉字字目下，还收集了有关甲骨、金文、小篆、隶书字形，并据近人研究成果，作出了相应的字形解说。从这个方面讲，它不仅仅是楷书汉字大汇编，也是古今汉字的大汇编。它上溯甲金篆隶，下及当代楷书，一典多用，人们可以利用它来研究上下数千年的汉民族文化，十分方便。

二、解 释 最 新

汉语字书的解释，不外形释、音释、义释三个方面。

关于形释:

《汉语大字典》曾调集专家,搜集《北宋以来,特别是近80年来出土的甲骨、金文资料以及历代篆文、隶书资料,并据近代古文字学专家的论著,作出系统研究,从中精选古文字形体,结合《说文》的字说成果,对汉字由古文而楷书的形体结构及其演变作出简要解说。凡有甲、金、篆、隶的楷书汉字,在字目之下,注音之前,均按时代先后分栏列出从殷代、西周、春秋战国、秦汉魏晋的各种古文字形体。其字形说解,以分析形体结构的演变,说明文字本义或较早字义为限,一般不涉及引申义和假借义,用以配合楷书汉字的释义,使字形说解具有参证古今的作用。

字书编制,宜祖《说文》,这是汉语字书编制的传统。《汉语大字典》的字形说解,特别注意对《说文》的补充和订正。凡《说文》说解正确者,即引《说文》为释,如第五卷的“素”、“纽”诸字。《说文》无误,又有其它古文字资料者,再引甲骨、金文等古文字形体予以补证,如“结”引《侯马盟书》、《武威汉简》、《流沙汉简》等新出土篆、隶字形;“绝”引甲骨、金文字形作为补证。《说文》有误,又有甲、金等资料可以证误者,尽可能据前人研究成果,将其对该字的考释结论引进字典,并标明其作者、书名。其引证有必要补充者,则加编者按语。如“羊”字。《说文》:“羊,祥也。从𦍋,象头角足尾之形。”从语义考查,当先有羊的动物义,然后才有“吉祥”义,许慎以“祥”为“羊”的本义,倒果为因,不合词义引申的逻辑。再从金文形体看,也不象“头角足尾之形”。《汉语大字典》卷五“羊”在引《说文》之后,加上“按,王筠句读以为‘从𦍋’二字,乃后人增补,云:先有羊而后有𦍋,羊字不可以𦍋也。容庚《金文编》卷四:‘羊,象羊首形’。”又在本义中指明:“羊,哺乳动物,牛科,种类较多,如绵羊、山羊、黄羊、羚羊、青羊、盘羊等。”就以金文材料和新的动物学分类知识纠正了《说文》的误释。又如“美”字,许慎据篆文释为:“美,甘也,从羊大。羊在六畜主给膳也,美与善同意。”是说“羊大”会意为美,其本义为甘美之美。但从甲骨文资料考查,“美”字“羊”下是个“人”字,不能作大小的“大”字解释。“美”作为会意字,当是“从羊人”,即“羊人”会意为“美”,这个“美”并非“甘美”的“美”。“甘美”是“美”的一种感受,但不一定是“美”的造字本义。《诗·七月》:“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这条材料证明,并非“羊大”为“甘美”,而是“羊小”为“甘美”。小羊羔在古人眼中倒是极鲜美、极宝贵的,它可以用来祭祀司寒之神。那么“美”字本义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那还得从“羊人”所会之意中去寻找一个更为合理的解释。汉字是表意文字,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常常影响汉字结构,从汉语文化史的角度来研究其中的规律是很有趣的。如奴、婢、奸、妒、妖、嫉诸字都从女旁,皆有贬义,反映了男尊女卑的思想文化观念,这是后来造的形声字,早期母权社会绝不可能造出这类字来。又如狡、猾、狠、猖、狂、狰、狞诸字都从犬旁,多有贬义,从这些字的结构可以看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犬的形象很不美。古代如此,今天我们骂人,什么“走狗”、“狗奴才”、“狗东西”等,还总把它带上来。狗肉有营养,人们也爱吃,但民间有“狗肉好吃名声坏”、“狗肉上不了正席”的说法,好象狗一钱不值,连吃它的肉都名声不好听。这种贬狗的美学心理,和欧洲人酷爱牧羊犬的情况绝然不同,显示出鲜明的民族特徵。中国人酷爱的是羊,总把羊看成是吉祥、善良、美好、羲和的象征,祥、善、美、羲诸褒义字皆从羊就是证明。从甲骨、金文材料看,“羊”象羊首形,“羊人”为“美”,会意当为人饰羊首之形。故《汉语大字典》“美”字说解中,在引《说文》之后,又补引李孝定《甲骨文集释》:“疑象人饰羊首之形。”有此补释,就足以说明“美”字本义非“甘也”,或至少说明“甘也”的说解尚可讨论。

《汉语大字典》根据最新文字学研究成果对汉字所作的字形说解,文字虽极简略,但却是

多代人研究成果的结晶。它集中了目前出土甲骨、金文中已能辨认隶化的确有解说的字形材料④、以及《说文》等秦汉魏晋的小篆、隶书材料,结合楷书字形、字音、字义发展的现实,纵观源流,详作考证,力争从中理出规律,作出合乎情理的解釋,堪称是当代汉语文字的一个科学的总结。文字是活化石,它是揭开人类文化遗产的一把钥匙。离开方块汉字,我们就不能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如果顺着《汉语大字典》字形说解的线索继续研究,将会有许多新的历史见解。例如,所释“羊人”为“美”,是不是可以进一步理解为“饰羊首之形”的原始图腾乐舞呢?中国姬周文化是从黄土高原发展起来的,那里畜牧业很发达,曾给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留下了深刻的影响。原始牧羊部落的祭司或酋长们常“饰羊首之形”且歌且舞,人们觉得他美,于是就造出这个“美”字来,这很可能反映了中华民族原始的艺术美的观念。联系祥、善、義诸字的结构及其得义之源,这些美学思想的阐述,都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从这个意义讲,《汉语大字典》的字形说解及其本义的分析,是可以供各方专家利用的,它不仅仅是文字学家的事情。之所以能如此,原因很简单,它是根据古代文化史实,根据以往多方研究的成果,对文字结构及其本义所作的最新解释。

关于音释:

《汉语大字典》的音释兼包古今,三段标音是其特色。

标注古今音读,本是字书的一个传统。

《说文》因形说音解义,主要从分析形声字的结构确定字的音读;还用“读若”、“读为”等比次声音,说明字义;有些字还用直音。这些注音方法所标音读,在东汉已有兼包古今的内容。

《玉篇》以来楷书汉字字典,除直音外,主要用反切注音。以后有《切韵》、《广韵》、《集韵》、《中原音韵》等各代韵书,专集各代音释,从声、韵、调上作出系统归纳整理。《康熙字典》集历代字书、韵书及各种古籍音释编成字典,在备载音切上下了许多功夫。但《康熙字典》的注音有严重问题:(一)《康熙字典》的编纂者不明古音,它把宋代吴棫《韵补》、朱熹《诗集传》中的“叶音”(又叫“叶韵”)搬进字典,当作“古音”;(二)又把以《广韵》为代表的中古音和以《中原音韵》为代表的近古音相提并论,将其中反切混同为“今音”⑤。这两条错误,使《康熙字典》的注音形成了“不今不古”的混乱局面,一直影响到《中华》、《大汉和》和《中文》的注音,虽然,它们都删去了“叶音”,但“今音”的混乱局面,一直未得到一个合理的解决。

汉语字书、韵书中的古代音释资料极为丰富,其完善性是世界诸语种中极为少见的现象。但这些资料,因出自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不同作者之手,由于时空的变化和记音者的不同,往往同一个字有多种不同反切,领属不同字义,呈现纷纭复杂的局面,光用“备载音切”(《康熙字典·凡例》语)的办法给汉字注音,必然造成混乱,这就需要认真清理。

汉语音韵学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它在清理古今音释上做了许多工作。但宋元以前,人们并不明白古音系统。从汉代起,人们读《诗经》、《楚辞》,由于时代发展,许多原先押韵的诗句,后人读起就不押韵了,有人就据当时今音给以“改读”。南北朝时,这种“改读”以求押韵叫做“比音”、“叶韵”、“协句”。到宋代,这种“改读”就成了风气,当时叫“叶音”,吴棫《韵补》、朱熹《诗集传》就是代表。例如,在《诗集传》中,同一个“家”字,在不同诗句中共注上五个“叶音”,好象在上古这个字没有固定读音。这是一种糊涂观念,它否定了语言的社会性,不承认语音也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历史事实。明代陈第著《毛诗古音考》,大破“叶音”说,提出:“时有古今,地有南北,字有更革,音有转移,亦势所必至。”⑥这就为清以后古音学研究指明了方向。自是以后,人们以中古韵书为出发点,结合先秦语音资料的分析归纳,辅以当

代方音的考释,在上古音系的研究上取得了一系列进展。顾炎武分古韵为十部,江永分十三部,戴震分九类二十五部,段玉裁分十七部,孔广森分十八部,王念孙、江有诰各分二十一部(两人所分不尽相同),章炳麟分二十二部,黄侃分二十八部,到王力考定《诗经》时代古韵二十九部,又据《楚辞》用韵情况定战国时代为三十部。这是目前公认的上古音的韵部系统。上古音的声类、调类的考证也有进展,但目前尚无一致意见,难以论定。中古音声、韵、调,因比较接近现代音,又有《广韵》一系韵书记载,有等韵、字母之学可作参考,其系统性认识也比较一致,只是古音重建争论较多,均属具体音值问题。现代汉语的音读,以北京语音为标准,由于《汉语拼音方案》的确立,对于标注汉字当代规范性的音读,非常有利。这些汉语音韵学和当代语音规范化上的成果,为《汉语大字典》的三段注音提供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汉语大字典》的三段标音,自始至终贯穿着“音随义转,音义密合”的原则,从汉语声韵发展的系统性上下功夫,努力克服旧字书注音的混乱局面。其主要成就是:

(一)《汉语大字典》的三段标音,首先突出了现代规范化的标准语音。其现代音按《汉语拼音方案》标注。凡多音多义字,均在同一字目下分别不同音项,用(一)(二)(三)等表明音项次第,然后以类相从,将该音项下字的本义、引申义、假借义按序排列。它严守“今音从今”的原则,凡已经普通话审音委员会审定的,均按审定音标注。未经审定的,参照《现代汉语词典》、《新华字典》标注。地名用字,一般均据已审定音及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有关资料标音。未审定的,根据“名从主人”的原则,确定该字的现代读音。人名的注音,亦按此原则处理。古代人名的字音,凡与今音差别大而必须标明者,均据古音与普通话的对应关系推出今音。方言字的注音,主要参照《现代汉语词典》和《新华字典》标注。不见于此两书者,据方言词典标注,或据方音与普通话的对应规律推出普通话的读音。《汉语大字典》收字五万七千个左右,其中,在现代各类词书、字典中已有现代注音的约一万五千字左右,还有四万多字至今尚无现代音释(只有古代反切等注音),《汉语大字典》通过以上措施,给所有汉字都注上了规范的现代音。这一浩繁工程的完成,使字书音释中“音随义转,音义密合”的原则得到了全面贯彻。现在,人们开卷了然,即使你不懂得汉字的古代注音方法和手段,你也可以从这部字典中得到全部汉字合乎现代规范的标准音读及其所属字义系统。

(二)《汉语大字典》的中古音标注,主要从以《广韵》为代表的《切韵》一系中古韵书中选取反切,并标明其调、韵、声。其选切的原则是,先从《广韵》选取主切,《广韵》没有时选《集韵》,《集韵》没有时从《类篇》及其它中古韵书、字书中选取。所选音切,以古籍中出现频率高,与现代音有明显传承关系,又与上古谐声系统相符者为主切,其它反切则作又音处理。凡近古韵书中的反切,只标反切所出书名,不标音韵地位(即不标声、韵、调),以示与中古音系相区分。中古韵书,因《切韵》已佚,《广韵》是其代表,这是目前语言学界的共识。《切韵》中古音系的基础,是公元六世纪(隋代)南北士人通用的雅言,是以洛阳、金陵两地士人的书面语音为基础的一种语音系统,它也是从唐至清各代文字书面语共同遵守的标准音,这已是学术界的定评。《汉语大字典》的中古音标注,正是根据音韵学研究的理论成果,认真清理中古反切的必然结果。在大型汉语字书注音中,这样全面、系统认真清理中古反切,尚无先例。

(三)《汉语大字典》中的上古音只标上古韵部,即阴声九部、入声十一部、阳声十部,合计三十部。这个古韵三十部,主要是《诗经》入韵字反映出来的韵部系统,同时也照顾到《楚辞》所反映的韵部系统,也具有早期汉民族共同语音的性质。在大型字书中,标注古韵部,这

也是开创性的工作,对于研究字义的源流变迁,说明声韵通转之理都极有科学价值。

总之,《汉语大字典》的音释采用三段标注,有重点地标明字音源流,显示了不同语音史段字音与字义之间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它把现代规范化的标准语音放在首位,又把中古音韵地位和上古韵部给以清理,备载于后,这样,人们就可以藉此追溯当代普通话语音的历史渊源,并以此来配合其整个字义解说系统,真正做到从古今音读上实现其“音随义转,音义密合”的系统性要求,彻底改变了旧字书注音中“不今不古”的混乱局面,充分显示了汉语声韵发展的系统性。

关于义释:

《汉语大字典》的义释亦兼包古今。科学概括,合理归项,务求字义共时性与历时性统一,力争达到释义的新、准、全,是其特色。

汉语字书,特别是大型汉语字书,一直在释义方面追求一个溯源及流,兼包古今的理想境界。《说文》因形说音解义,重在溯源。《玉篇》承《说文》之绪,大力解释常用字义,重在及流。到《康熙字典》按经、史、子、集范围罗列字义,虽涉源流,但毕竟不是按词义本身演变的规律来整理字义,这就既难描写当时横向的字义内容,也难反映纵向发展的字义史迹。后人批评《康熙》“一义之释,类引连篇,重要之义,反多阙漏”^⑦,问题的症结,即在于此。现以“將”(将)字为例,比较《康熙》与《汉语大字典》在释义方面的异同。

“將”在汉语中是一个多音多义字,又是一个古今常用字。在清初康熙年间,“將”的音义系统已经成熟,各项语言资料均不难找到。但《康熙》“將”下除“叶音”外,只列三个音项,分属二十一个义项,它的音义系统非常混乱。“即良切”下领属“将帅,一日有渐之辞、甫始之辞、将然之辞”,同一义项,将名词义和副词义混在一起,且无足够语言材料给以证实,已是义界不明。“即諒切”下又释“将帅”义,更是重复。“千羊切”下,领属四个义项,除能愿动词“几愿辞也”一义可以成立外,其他皆据《诗经》例句中“将将”叠音词分释为“集也”、“严正貌”、“声也”三个义项,皆复音词的象声词义,并非“將”的单字有这些字义。这些字义,皆据传统训诂随文释义的材料作释,根本谈不上科学概括,合理归项。因此,它的释义,一是不准,二是漏释严重。

《汉语大字典》“將”字列五个音项,分别领属三十六个义项。以(一)jiàng(子亮切,即《康熙》所列即亮切)为第一音项,所属有①将帅;将领。②统率;率领。③威武。④军衔名。⑤能手。这五个义项,不但比《康熙》同一音项下所释更新、更准,而且正本清源,将其中字义作了清理,既照顾到“將”在这一音项下的字义演变的史迹,又充分描写了它横向的现实字义内容。接着又列(二)jiāng; (三)qiāng; (四)yáng; (五)jiang四个音项,分别领属“將”由名词义而引申出来的动词、形容词、副词、介词、连词、代词、助词及假借诸多义项,这就使“將”的源流纵横的字义得到了全面系统的解说。

从字形说解,三段注音和字义源流纵横的全面说解三个方面考查,《汉语大字典》在大型汉语字书中解释最新,诚可谓史无前例。

三、举 证 最 全

一部大型字书的价值,主要在于释义的新、准、全。而要使它的释义具有权威性,关键又在于举证。

注重实证,也是汉语字书编制的一个传统。

许慎采史籀、李斯、扬雄之书，博访通人，考之贾远而著《说文》，其释皆有所据。

《说文》之后，楷书汉语字典一直重视举证。《玉篇》“总汇众篇，校讎群籍，以成一家之制”^⑥，每字之下，广采例证，博引传注，从原本《玉篇》残卷看，已具大型字典的雏形。《康熙字典》搜罗宏富，其义证更是盛况空前。但其举证，问题不少。王引之作《字典考证》，光核对引文就发现二千五百余条错误。日本汉学家渡部温作《标注订正康熙字典》，考异一千九百三十条，订误四千条，两项相加就近六千条。后人又续有考证，发掘其举证错误至多，归纳起来不外（一），转引它书，用第二手资料，致违原文；（二）引证不知溯源；（三）不注重语言的典范性；（四）注疏相混，或杜撰注文，望文生训等等。

鉴于以往字书引证中的问题，《汉语大字典》强调举证要从原著直接引用，要注意例证在语言中的典范性，时段性和全面性各方面的要求，现再以“將”字为例说明之。

《康熙》“將”下三个音项二十一个义项共有举证35条，其中书证10条，涉及《说文》、《唐韵》、《广韵》、《集韵》、《增韵》、《正韵》六种古代小学著作；例证19条，涉及《诗》、《书》、《易》、《左传》、《楚辞》、《史记》、《汉书》七种经史著作；疏证6条，涉及《书》、《诗》、《楚辞》、《礼记》、《汉书》五种古注，其中只有《汉书》颜师古注、苏林注（此为转引）道出姓名，其他皆不知出自何家之手。

《汉语大字典》“將”字共五个音项三十六个义项，共有举证224条，其中书证49条，涉及《说文》、《广韵》、《集韵》（以上三种《康熙》已涉及）、《尔雅》、《释名》、《方言》、《广雅》、《玉篇》、《助字辨略》、《经传释词》、《经传释词补》、《词诠》、《古书虚字集释》共十三种古今小学著作；例证224条，涉及《诗》、《书》、《易》、《左传》、《楚辞》、《史记》、《汉书》（以上七种《康熙》已涉及）、《论语》、《孟子》、《周礼》、《礼记》、《仪礼》、《战国策》、《国语》、《后汉书》、《三国志》、《新唐书》、《辽史》、《史通》、《老子》、《庄子》、《墨子》、《孙子兵法》、《管子》、《韩非子》、《荀子》、《列子》、《淮南子》、《吕氏春秋》、《说苑》、《法言》、《世说新语》、《穆天子传》、《荆楚岁时记》、《洛阳伽兰记》、《宣和遗事》、《通志·氏族略》、《秦併六国平话》、《唐三藏取经诗话》、《二程全书》、《乐府诗集》、《水浒传》、《红楼梦》、《老残游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象》、《中国社会主义高潮》，还有魏曹操、晋陶潜、北周庾信、唐李白、杜甫、白居易、柳宗元、韦应物、李商隐、卢纶、卢象、孟郊、宋苏轼、王安石、杨万里、李清照诸人的诗文辞赋，元王实甫、关汉卿、高文秀诸人的戏曲，明郭登、清孙枝蔚、吴麐、张维屏、王夫之诸人的诗文，近现代严复、章炳麟、鲁迅、茅盾、郭沫若、毛泽东等人的各类著作；疏证43条，除《康熙》所引外，还有毛亨、郑玄、孔安国、王肃、韦昭、王逸、杨倞、高诱、李轨、孔颖达、司马贞、贾公彦、邢昺、王念孙、郝懿行、陈奂、钱绎等汉、魏、晋、唐、宋、清诸代著名训诂家为各类古籍所作的传、笺、注、疏。

“將”字举证说明，《汉语大字典》的举证，不仅在总条数上六倍于《康熙》，书证、例证、疏证三证俱全，而且贯穿古今各类著作。其举证之全，也是《康熙》等字书望尘莫及的。

四、体例最精

《汉语大字典》规模最大、解释最新、举证最全，渊源于它的最新体例。它在收字上，上溯甲、金、篆、隶，下及当代楷书，全面清理汉字繁演的史迹；在注音上，它采用三段标注，使音义密合，充分显示汉语声韵的系统性；在释义上，它科学概括，合理归项，务求字义共时性和历时性统一；在举证上，它强调直接性、典范性、时段性、全面性，使其三证具

全，兼顾源流，明证古今。这些，都是在编写中全面贯彻其“源流并重，古今兼收”的总编写方针的必然结果。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是汉民族文化传统最重要的信息载体，也是数千年来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一种重要工具。在我国历史上，大型字书的问世，总是与时代的进步和文化的繁荣紧密相连的。《汉语大字典》迎着改革的潮流破土动工，艰难跋涉，历十五年之久，终于编纂成功并全部出版，它没有辜负人民的厚望和时代的要求。它面对数千年传统文化，面对汉字由甲骨、金文、篆文、隶书而至当代楷书汉字的繁演史迹，进行系统研究，作出符合语言史实的崭新解释，这对汉语史和中华民族文化史的贡献将是无法估量的。日本汉学家森濑寿三教授给李格非教授来信说：“这道事业，也可以说是和修建长城一样的艰巨和伟大”、它“是民族宿愿已经开始进展的事实。”他还称赞《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将是“文化的长城，汉语的双壁”。

当然，和所有大型辞书一样，《汉语大字典》也不可能尽善尽美，需要补正的地方不少，这也无庸讳言。但基地已经建立，修改、再版亦正在准备。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这座文化的长城、汉语的丰碑，将会修饰得更加雄伟和壮观。在这方面，我们对后来人寄予着厚望。

注释：

① 《类篇》旧题宋司马光撰，它是用《集韵》的材料，再以部首分类编成，实际上是王洙、胡宿、张次立、范镇等人相继纂修，最后由司马光“缮写奏进”而成。

② 《正字通》一说为廖文英作。此据《四库提要》和近人余嘉锡《四库提要辩证》卷二《经部二》的考证，以张自烈作为是。

③ 此为《大广益会玉篇》张泽存堂本字数。原本《玉篇》仅有残卷无法统计。唐封演《封氏闻见记》所称《玉篇》字数与此异。

④ 到目前为止，甲骨文已出土15万片以上（据胡厚宣说），单字4500个左右，可以辨认隶化者占 $\frac{1}{3}$ ，金文出土中可以认识的字有2420字，尚有1352字还不能确认（据《金文编》1983年读订本统计）。

⑤ 见《康熙字典·凡例》中有关音释条例。中古韵书，因陆法言《切韵》已佚，今皆以《广韵》为代表，包括《集韵》等韵书；近古韵书，以《中原音韵》为代表，包括《中州音韵》、《词林正韵》、《洪武正韵》、《五方元音》等韵书。

⑥ 陈第《毛诗古音考·自序》。

⑦ 见《中华大字典·熊希龄叙》。

⑧ 《玉篇·顾野王序》。

（本文责任编辑 张炳煊）